

建立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東亞區域合作*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會長 梁維特

澳門的經濟在近年無疑有相當程度的發展，根據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組的科研意見，澳門已於九九年完成第一次現代化的進程。然而，由於受到自身內部多種因素的制約，澳門在回歸前後的發展其實並未如人意，原有優勢有所削弱，新的增長點並未浮現，澳門經濟結構迫切需要調整提升。同時，全球經濟一體化和知識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內地近年經濟迅速發展的外部環境，為澳門的發展帶來許多潛在的機會，也帶來了許多新的挑戰。這就是說，內外環境都要求澳門作出積極而恰當的應變，否則，“乳酪”很可能迅速離澳而去。

自實行“一國兩制”以來，特區政府的施政基本上反映了社會的客觀需要。澳門特區政府2002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首次明確指出了澳門未來產業結構的新格局將是“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這一定位集中體現了澳人的共同智慧，理所當然地得到市民的認同。最近，特區政府成功在博彩業引入競爭機制，更進一步增強了海內外投資者對澳門的關注和投資的信心。誠然，能夠取得賭牌的只有三大財團，但機制的改革、觀念的更新，卻使博彩旅遊業及其相關行業，甚至其他產業，萌發出眾多嶄新的經濟增長點。

正當澳門經濟出現重大轉機之際，我

們察覺到，作為近鄰的東亞地區亦出現了新的變化。亞洲金融風暴以及去年的全球經濟不景氣，使東亞經濟發展呈現較大的波折，然而，中國經濟依然令人欣喜。這種客觀情況，使得東亞的合作進程明顯加快。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啟動，中國與東盟邁開了設立自由貿易區的步伐，以至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共識的確認，反映了東亞各國加強合作，互促發展的共同願望。以2002年1月中國與東南亞進出口貿易為例，貿易額對比去年同期已增長23.2%，可以預見，中國與東南亞經貿合作的發展將不斷加強和擴大。

澳門作為一個背靠中國大陸的外向微型經濟體，發展對外關係，積極參與區域合作，肯定是本地區的基本區策。不過，有合作意願並不代表就能自然結出合作的豐碩成果。在目前的大氣候下，澳門要在區域合作中發揮特殊作用，就不能單靠傳統的經貿活動，必須尋找新的突破口。個人認為，澳門現有產業中，除旅遊博彩業一枝獨秀外，製造業、金融保險業等產業仍將在澳門產業結構中佔有相當地位，在加強與鄰近地區，以至東亞各國的合作方面，將會繼續發揮其積極的作用，但是，我們亦應當根據本地區的發展定位，促進新經濟增長點的形成，強化本澳的比較優勢，實現與東亞地區的優勢互補，力爭共贏局面。

一. 發展文化旅遊產業，促進東亞各國文化交流

澳門旅遊業無疑與博彩業緊密相連，但就旅遊和統計部門，以至傳媒訪問的綜合訊息顯示，相當部份訪澳旅客的造訪目的是與澳門的文化特色和悠閒氛圍密切相關。

澳門是一個擁有數百年東西文化並存的小城，也是一個優閒的度假勝地。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並因應政府最新的產業結構發展定位，大力發展文化旅遊產業，將是澳門的一個重要經濟增長點。發展文化旅遊產業，首先是因為我們有比較堅實的基礎：數百年來建成並保存下來的古跡，它們既有歐陸情懷，又有傳統中華文化的精髓，這些蘊含孫中山、鄭觀應、利馬竇等中外歷史名人風采的古跡，隨意卻又和諧地分佈在澳門不同地區，與當地的純樸民風、中葡民俗風情、各具特色的小型博物館一起，把整個澳門構建成一個多元文化博物館；同時，特區政府與民間組織終年舉辦大量展覽、表演等形式的文化活動，成為豐富的動態旅遊資源。政府力推的文化之旅以及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工作的啟動，可見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其中國際藝術節、國際音樂節等已成為本地區旅遊的重要品牌，不少旅客更成為固定的觀眾。其他如美食節、潑水節、浴佛節(舞醉龍)等以民間為組織主

體的大型文化旅遊活動，也深受旅客的歡迎。

應該承認，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澳門文化旅遊產業尚存頗多未成熟之處。根據本地區旅遊發展的潛力和有利因素，宜考慮在以下若干方面努力，以推動此一新增長點的快速發展：(一) 發揮和強化本澳文化旅遊資源的潛力：1. 修繕及美化主要景點的多種語言解說牌、派駐定點講解導遊、引入多種語言的自助流動解說設備；2. 引導政府和民間所舉辦的各類型本地區文化、表演、展覽、民俗活動，適當兼顧遊客的興趣，並透過專業人材的協助支援，提升其質量及加以包裝，同時，透過鼓勵措施，銳意引入或創作具有文化特色的旅遊項目，進一步形成和發揮文化旅遊的品牌效應；3. 辦好跨域性書展、高水平文化研討會等區域文化交流活動，營造更佳文化氛圍。(二) 政府宜重視系統觀念，可考慮在定期、持續地進行調查分析的基礎上，充份發掘民間文化活動的旅遊含量，及時把當中的精品納入本澳旅遊資源系統之內，統一向目標旅遊市場推介。(三) 澳門的城市結構和文化氛圍，使澳門文化建設存在可行性，此點在東南亞地區應可算是獨具風韻，因此，澳門可以在建設好文化旅遊產業的前提下，在東亞地區的合作中，扮演一個文化交流平台的角色，例如由本澳和駐港領事館等機構合作，以定期(如每季度舉行一次)或不定期的形式，分別舉辦東亞各國的民族節日活動等，以宣傳推廣當地的文化、藝術、習俗及投資環境，吸引訪澳旅客在日後到當地旅遊、投資的興趣。這些活動如能取得駐澳、港領事的全力配合，則必定會事半功倍。而本澳人數不少的東南亞歸僑和外國留學生組織所潛藏的能量亦不宜被低估。去年在本澳舉辦的“日本文化祭”深獲市民和遊客的好評，其經驗應予總結和推廣。(四) 發展文化旅遊產業宜推動全澳市民的共同參與，各行各業都應主動作出配合，民間舉辦的大型文化活動宜及早通報旅遊部門，並適當為旅客預留參觀機會。當然，本地人員的友善態度、服務素質、語言能力的提高已是社會的普遍共識。而事實上，文化產業的發展，可以為澳門吸引更多的旅客，又反

過來可以推動澳門相關行業，如手信、古董、零售、飲食等的發展，因此，應將此一觀念向社會廣為宣傳，學術界和業界更可考慮把之引入更為深化及可操作性的層次。

二. 建立環保產業，加強東亞各國環保技術交流

環境保護是世界各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份，隨着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關稅壁壘的影響有所下降的同時，非關稅壁壘的影響和制約將日見顯著，因此，對大部份中國鄉鎮企業和中小企業而言，環保因素所帶來的挑戰是非常大的，同時，從提高國民素質的角度而言，環保產業所帶來的機遇又是前所未有的。

面對內地在環保方面的新動態，澳門特區政府提出致力於“逐步完善環保基建項目，加強區域性合作和宣傳教育工作”，以及“創造條件，推動澳門成為中外環保產業的聯繫平台和合作橋樑”。特區政府是希望把握環保產業帶來的機遇，尤其是抓緊中國入世以及國家對環保政策不斷加大投資力度的條件下所湧現的商機，推動澳門成為中國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西部和外國中小型環保企業的合作平台。

無疑，本地區的環保工作尚在耕耘階段，但整體社會近年的環保意識確實不斷提升。我們已經擁有技術水平較高的廢棄物焚化中心，亦成功將垃圾堆填區改造為受大眾歡迎的，集優閒、康體於一身的公園，而每年約佔全球數量4.7%的珍稀鳥類黑臉琵鷺停居本澳過冬，這說明澳門的環保工作是有一定基礎的，只要加以適當的引導，相關產業將大有可為。我們注意到，在東亞地區的日本、新加坡等國家，在環保方面享有較高的國際聲譽，因此，本人認為，本地企業家宜把眼光積極投放於環保這樣一個既利國利民，亦有明顯經濟價值的產業，而特區政府在政策和訊息方面給予充分的支援，將有助本地企業競爭力的提升。

澳門企業加強和東亞各國中小企業的

合作和交流，一則有助提升澳門環保技術，優化澳門的城市環境，間接促進旅遊業的發展。二則可與東亞中小企業組建策略聯盟，利用澳門作為中介平台，參與珠江三角洲西部，以至整個中國，尤其是西部環保產業的開發。

三. 提升博彩業專業化程度，建立區域博彩業孵化中心

在澳門有百多年的發展歷史，原有業界在經營、管理方面已有頗為豐富的經驗。隨着澳門博彩業的開放，大型外資博彩財團的進入，競爭機制的正式啟動，此一行業將進入一個更為健康和快速的發展階段，打造一個名符其實的“澳門優質博彩旅遊”品牌將大有可能。

要實現上述目標需要多方面的共同配合。其中，引入國際公認的考核制度和專業資格認可機制，將是快速提升本地博彩業經營者和從業人員素質的可行措施，此亦為另一順應澳門未來發展的經濟增長點。憑藉在博彩方面的經驗、國際網絡和發展趨勢，澳門可整合高等院校、機構或企業的力量，然後積極與國際認可機構合作，在澳門設立區域性“博彩專業資格認可及評核中心”，並開設不同程度的正規博彩管理課程，為大面積培訓本地區的專業人材服務。環顧東亞，不少地區的博彩業同樣存在提升素質和人材供應的問題，那麼，澳門未來的資格認可及評核中心應可就近為東亞，以至亞洲其他地區博彩事業的健康發展，提供專業和後勤服務。

結語

各位來賓，互補合作是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在澳門經濟新的發展階段，透過加強澳門和東亞地區的合作和交流，有利於有效催生和培育澳門新的經濟增長點，亦有利於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善用澳門此一中介平台，彼此皆可受益。本人想強調，要成功實現區域合作，除了各國、各地區政府的努力外，亦必須充份調動業界和市民的配合。以上所述僅為個人的一些淺見，尚望各位批評指正。

充分發揮澳門優勢 加強澳日企業合作*

蕭氏集團有限公司董事 蕭志偉

當今世界，日本仍是美國以外最大的經濟強國。2000年日本GDP為47,496億美元，高居世界第二；對外收支順差長期居世界第一；2000年底，日本的外匯儲備超過3,616億美元，居世界第一。至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總資產約為32,046億美元，佔全球海外淨資產的一半以上。對外純資產方面，2000年為11,579億美元，是世界最大的債權國。雖然，日本的經濟實力很強大，但在20世紀80年代後，日本沒有順應國內外條件的變化，將大量過剩資本投入知識化、資訊化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創新，而是流向房地產和股市，導致經濟泡沫，特別是資產泡沫。因此，造成了近10年的經濟困境。

為擺脫這狀況，日本首相官邸產業構造改革和僱傭對策本部的設想是，今後的國內的產業結構將不再以製造業為主，而將發展重點轉到旅遊、商業、資訊通信、環境保護、能源開發、物流、交通、金融保險、醫療衛生、老年護理、教育科研等方面。為了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日本政府對新興產業給予各種優惠，相比之下，製造業的發展條件則差得多。因此，迫使大量從事製造業的企業要轉移到國外去，以爭取新的發展機會。

日本貿易振興會2001年8月發表的投資白皮書顯示，因為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加入WTO後的市場潛力巨大，故今後的三年內，95%的會員將選定中國為海外直接投資的最佳地點。事實上，日本企業界是熱衷向中國轉移生產。日本經濟產業省2月份的調查報告顯示，每7家的日本製造企業就有一家已經或即將向中國轉移生產基地。

日本企業在中國投資的時間很早，在與澳門相連的珠海及珠江三角洲一帶，早已有不少知名的日資企業進駐，而回歸後的澳門，來澳投資的日商也有所增加的，當中以住友培克的項目最矚目。

雖然澳門與內地相比，沒有低廉的勞動力，但澳門自身是存在不少優勢的。澳門早已是WTO的成員，屬外向型的自由城市，沒有外匯管制，原材料及貨物進出方便，有完善的法律體系，稅收單一、偏低，物業成本便宜。回歸後的澳門特區政府，在不受中央政府的干預下，充分發揮了“一國兩制”賦予的空間，改善了澳門的環境，創造了投資的自由空間，完善了對外的交通，加上背靠潛力巨大的內地，與珠江三角洲的密切交往，都對外來投資者存在吸引力。

我們吸引外商必須腳踏實地，不要貪大的瞄向跨國大企業，否則其結果只會吃力不討好。我們應該將引資目標群鎖定為中小企業類，因為他們不僅是任何地區經濟發展的基體，且因他們沒有太多的管理程序，自主性強，適宜澳門現有的環境條件。

促動日本的中小企業群來澳發展，我們應以民間、非政府的機構與機制，來推動澳日企業的合作，因為這是一個成本低、效益好、見效快的切實可行方式。企業家是明白經濟合作不僅是政府的任務，任何企業從自身利益出發，也願意參與經濟合作的政策與制度之建立。

重視民間及企業的作用，對推動澳日經濟合作有着特殊的意義。民間的框條少，思路靈活，能夠多元化、多角度、

多方位地進行兩地間的企業合作。企業來自市場，有切身的利益，他們提出與推動的計劃會更重視經濟效益，市場的風險會最低。

需要說明的是，以民間、非政府的機構與機制為主導來推動的經濟合作中，澳日兩地的政府是起着非常關鍵的作用。沒有政府的支援與認可，有關合作是不可能持續性及縱深地發展。兩地政府的參與，還可將合作的範圍擴大，築成一個平台，適時地發揮政策與外交的協調，必要時並給予一定的資金及資源的支援。

有關構思，實際已有組織實施。如澳門留日同學會舉辦了三屆的日本文化祭大型活動，每次既吸引了大量的本地居民和遊客參與，也創造了理想的商業效益，並起了積極推介日本文化的作用。事實上，這是一個很好的以民間組織為主導，專項為媒介的澳日民間組織合作模式。我們應該以此為核心，完善一個澳日企業合作的平台，凝聚已在澳發展的日商，產生發酵作用。今後，我們需要以該平台為聚合體，定期推出專項的活動，形成澳日企業合作的點，再以點連線，線成面，面築體地務實漸進，必會為兩地企業創出盈利空間，推動兩地的經濟、文化發展。

依循政府政策發展的軌跡，是企業能夠獲利的重要舉措。澳門的旅遊博彩業既是龍頭行業，也是很好的優勢。過往來澳的日本旅客很多，1996年時高達52萬人次，但金融風暴後，加上回歸前澳門治安的短期影響，來澳的日本旅客急促下降。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資料顯示，2001年來澳的日本旅客降至140,937

人次，2002年1月為11,116人次，2月為10,075人次。

無疑少了來澳的日本旅客，令澳門的多個行業收益減少，但這不是單方的，因為日本的相關行業也失去了不少生意。現在談的是“充分發揮澳門優勢，加強澳日企業合作”，我們提議先由旅遊業做起。這是不需進行建設，也能馬上執行的專項，同時帶動澳日兩地經濟，令雙方企業獲益的契機。

推動澳日兩地旅遊業的前行，為雙方企業帶來發展，發揮澳門與內地現存關係是有效的措施之一。今年是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30週年，中國國家旅遊局將與日本聯合推出“世代友好、相約日本和中國”的大型主題促銷活動。並已決定今年5月份，由國家旅遊局組織中國旅遊友好交流促銷團，深入日本47個都、

道、府、縣，開展至今最大規模的促銷活動。同時，日本方面將組織萬人的友好交流團到中國進行旅遊訪問，屆時並與中國各界代表於中華世紀壇，長城腳下共植中日友誼林。

表面上中日兩國這一重大行動，澳門沒有可能有所得益。事實非也，因為市場上早已為我們營造了商機。近年中國人的生活水準不斷提高，令他們花在旅遊的消費持續上升，且由國內短程的行程升級至海外旅遊。行程中很多旅行社都會安排團員有一程在澳門短暫停留，既豐富了旅行團的旅程，也為旅行社帶來更多的商機。

請大家細想，中日兩國正進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旅遊促銷活動，這次雙向的縱深發展，必會營造出深遠流長的效應。只要我們充分發揮“澳門中間站”

的旅行團模式，相信是加強澳日企業合作的很好項目。

結語

今年是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30週年，中央政府經已正式邀請日太子伉儷訪華，以進一步確立中日的友好關係，此一大好形勢，為澳日關係的發展，提供了關鍵的條件。澳門企業應積極發揮既有優勢，主動促進澳日關係的發展。同時，希望在各方的支持下，將一個促進澳日企業合作的平台構築起來，並在兩地政府的支援下，吸納有意向外發展的製造業，也為澳門的產業結構調整注入活力。現在我們期待繁花顯現！

以上僅為個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懇請各位不吝賜教。

學習、實踐，與時並進*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會長 梁維特

各位來賓：

非常榮幸得到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的錯愛，邀請本人參與慶祝“五·一”的“自強不息、把握機遇、接受挑戰”研討會，在各位專家、工運領袖、政府官員面前，我未敢班門弄斧，以下謹就“與時並進”這題目談談個人的幾點感受，謹期各位指正。

近十年來，澳門產業結構持續變化，製造業在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已由1989年的20.3%下降至2000年的9.7%。而同期，包括博彩旅遊業及服務業在內的第三產業所佔比重，則由75.4%，上升90.7%。當中，博彩旅遊業及其相關服務業在澳門經濟中的作用，更日形重要。與此同時，澳門特區政府在2002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了，澳門將逐步形成

“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的產業結構，此一定位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同，由此而催化的澳門社會和經濟諸方面的變化，需要我們積極面對和主動順應。

在外圍經濟環境方面，全球經濟一體化、知識經濟的急速發展，都使對外依賴性強的澳門微型經濟體系受到一定的影響；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市場逐步走向開放，澳門過去所發揮的窗口和橋樑作用亦必將受到影響。面對外圍經濟環境的挑戰，澳門社會亦須積極改變，以尋求新的出路。

除了外圍的和宏觀的經濟環境變化，促使澳門社會面對挑戰與機遇並重的前景外，澳門經濟自身發展亦同樣使到澳門各界必須因應變化而作出調整。隨着

澳門市場的逐步開放，越來越多資本雄厚的外國大財團或企業進入澳門市場，這除了將會為澳門經濟發展帶來促進作用外，還將為澳門市場帶來新的經營管理模式，此外，2005年全球成衣配額制度的取消，亦將為澳門紡織製衣業帶來相當大的影響。面對上述種種挑戰，澳門企業界要繼續生存和發展，就必須面對積極求變，創新經營的問題，同樣，澳門的打工仔一族亦須面對轉型、轉業的選擇。新世紀的市民要能不斷尋找新的、更鮮味的“芝士”而不被淘汰，就唯有強化、提升自己，在政府的扶持和群體的互助下與時並進。

提升素質，是近年熱門的話題，我們在這裏加以討論，並非追趕潮流，而是建基於實際需要。素質其實是指綜合素質，也就是個人自然素質、文化素質和

* 在澳門工會聯合總會主辦“自強不息 把握機遇 接受挑戰”研討會上的發言 (27.04.2002)

心理要素的總和。我們常講的提升素質，則主要是針對後二者而言，提升之法並無新意，關鍵是貴在堅持，其具體途徑，不外乎——學習和實踐。

在文化素質層面的學習，既包括原有技能和知識的更新提升，還包括新知識、新經驗的掌握。本澳目前有眾多的僱員從事於服務業，是不是每位服務業僱員朋友在現時或未來，必定能自然地受惠於龍頭和主體產業的發展呢？答案恐怕是“未必”。在這裏，容許我以美髮業為例，該行業是不折不扣的服務業，但現在的狀況怎樣呢？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其來自鄰近地區的挑戰十分明顯。美髮業現今的發展已趨於兩極化，一部份走高檔次路線，以優質服務為經營方針的美髮店，亦仍然生意滔滔，而相當數量營運模式變化不大的小型髮型屋則陷於艱苦經營，有關業界人士正面臨如何提升自我的問題。據今年四月十七日的傳媒報道，香港有關機構決定撥款140萬以開辦82班美髮課程，藉此培訓1,500名現職髮型師。在這個課程中，更有針對性的“穴位按摩技巧”及“髮廊應用英語”。這則消息對本澳業界人士應有相當的觸動和啟示。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該行業僱員亦並非坐以待斃。最近有朋友告訴我，本澳該行業的僱員組織現正全力聯絡有關機構，力爭透過適當的培訓、評核機制，實現自我積極增值，促進該行業的繼續生存和發展。這就是該行業發展的曙光所在，亦是澳門希望之所在。我相信，只要堅持努力，總會“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或許更多的、更新的、更美味的“芝士”是藏在迷宮深處，但只要不輕言放棄，我們總能找得着它們。

提升自我的另一不二法門就是實踐。需要轉業的朋友，在接受培訓後，至關重要的是敢於放下過往的經驗，大踏步重新上路，而大中學校畢業生更需要放下身段，在保持理想的同時，積極尋找第一份，即使是非本身意願和專長的工作。在往後的日子裏，實際工作經驗往往是致勝要訣和過人之處。在這方面，我自己亦有親身的經歷。一個可喜的現象是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已經接受了腳踏實地的觀點。可以預期，隨着經濟的進

一步復甦、企業投資的持續增多，新的“芝士”肯定會逐步浮現。

實踐並非簡單的重覆，有效的實踐意味着追求卓越、不斷創新。在現今激烈的競爭環境下，政府要創新，企業家要創新，僱員同樣要創新，而在港澳地區，僱員創新而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四學歷的香港髮型學徒羅偉昌就是一直堅持上進和嘗試，然後於今年一舉擊敗61名國際髮型大師，成為亞洲地區一項重要形象設計比賽的全場總冠軍。在本澳十分年輕的時裝設計行業，其從業員近期亦在內地的重要大賽中屢奪殊榮，既為澳爭光，也展現出澳人創新的潛力。如果有人認為，個別案例並無普及性，那麼，我想提醒大家，創意並無界限，現代科技固然講求創新，平常工作亦同樣存在廣闊的創新空間。那怕只是“做好一籠點心”、“沖好一杯奶茶”，亦大有創新和優質的學問。新一代的行業狀元應該是熟練與創新的完美結合體。我相信，“平凡中見不平凡”應該是創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失業僱員和待業畢業生亦可考慮創業。對創業者而言，創業也是一個創新的過程。香港最近提出要發展本土經濟，其要旨不在於大筆資金的投入，而在於推動市民發揮一技之長，並結合原有地區的文化和特色，經營創意小生意，從而達到創造就業機會、增加地區人流和激活店舖生意的目的。本澳舉辦多次的燈光夜市，除鼓勵留澳消費外，也蘊含上述要義。不過，即使是這些較低增值的小生意，也必須配合政府的總體發展定位，講究創意、質量和服務態度。政府今後在對這類活動進行資助鼓勵時，不妨考慮用傾斜方式，倡導上述三項，尤其是“創意”。

在觀念層面，我準備談兩點個人看法。第一，由於產業結構等的變化，肯定會有部份製造業或其他行業工人在未來難以在本行業繼續工作，面對現有“芝士”即將消失的現實，也唯有重新學習，以尋找新的出路。對於他們本身而言，年紀不輕，學習的黃金時機或已消逝，同時，學習內容更是全新的範

疇，其困難程度可想而知。但我希望，他們能夠重新強化“天助自助者”、“馬死落地行”的觀念，發揮毅力和意志，咬緊牙關參加轉業培訓。因為，除此之外，可能別無他法。況且，成年人儘管相對反應較慢，但理解力較強，亦並非全無優勢可言。對於這些處於弱勢的朋友，政府、團體和社會人士有責任予以積極而有效扶持，創設條件，鼓勵他們參與有實效的培訓，然後盡力協助他們實現轉業。當然，企業的經營亦必須秉持社會公義，我同意澳門中華總商會負責人早段時間提出的相關意見。在激烈的競爭中，企業可能需要進行瘦身以維持競爭力，但競爭力的提升並不完全等同於輕率的裁員。而且，不慎重的裁員，將會造成人力資源的不穩定性。再者，失業率的上升，亦將導致內部消費疲弱，反過來影響整體經濟的全面復甦。當前而言，關鍵是共渡時艱。

第二，部份製造業僱員朋友在準備或剛剛轉職至旅遊服務行業時，或會出現一些心理上的不適應，這些觀念障礙源自於工作關係的轉變，從過往主要的“人機關係”轉為“人際關係”後，相關僱員就要改變過往不需要“熱情殷勤”的基本工作態度。當然，現今社會重視人權和平等，我們毋需自貶身價，卑躬屈膝，但是“待人以禮，服務周到”亦無損自我身份。“正當職業無分貴賤”的觀念應重新在全社會得到提倡。部份人士北上消費的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就是要滿足被尊重的心態，這正是許多訪澳遊客的普遍心態。在價格不變或處於劣勢時，澳門的發展除要靠創意之外，還要靠服務質素。只有調整好服務心態，才有足夠的內驅力，不斷提高自我的服務水平。

經濟財政司譚伯源司長在今年工商座談會上致辭時指出，為適應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無論是政府工作人員，還是工商界人士，或者是僱員階層，都需要與時俱進，自我調整和提升，更新和充實知識”。對此，本人深感認同，謹希望在我的講話結束時，再次與澳門各界人士共勉。

我的講話完了，多謝大家。

新時期粵澳經濟合作的回顧、反思與前瞻

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 馮邦彥

一、90年代以來粵澳經濟合作不彰的癥結

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在中國改革開放方針的推動下，澳門與廣東尤其是珠海、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區的經濟合作取得迅速的發展。其中，珠海因毗鄰澳門，被闢為全國4個經濟特區之一，經過近20年的發展成為廣東著名的旅遊城市，而粵澳之間的經濟合作也從早期的貿易為主逐步擴展到投資、旅遊、房地產、運輸、金融、人才培訓、工程承包以及基礎設施建設等各個方面。

然而，1990年代中期以後，粵澳兩地經濟合作的步伐明顯減緩，雙方的競爭性加強，已影響了兩地，特別是澳門、珠海的經濟發展。回顧過去20年來的歷史，粵澳經濟合作不彰，其中的癥結，有兩點是根本的：

第一，澳葡政府的無為施政與珠海政府經濟發展戰略決策的偏差。

長期以來，澳葡政府對澳門經濟的發展就一直缺乏長遠規劃和策略，一直存在“小而全”自成一統的思想。1990年代中期，隨著澳門回歸的迫近，澳葡政府更是缺乏承擔和作為，實際上是放任自流。

在廣東方面，當時珠海市政府的一些領導幹部，由於對澳門的比較優勢認識不足，在經濟發展戰略決策上忽視了與澳門的區域性合作，反而強調西區的開發，強調“大工業”、“大港口”的發展，結果錯失了開發橫琴島的最佳時機。戰略指導思想的偏差造成了兩地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缺乏協調，重複建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珠、澳兩地各建機

場、大型賽車場等，加劇了兩地的競爭。

第二，澳門在經濟發展方面的比較優勢不明顯或弱化。

與香港相比，澳門的比較優勢確實是明顯不足。1980年代中期以後，澳門經濟原有的優勢，尤其是紡織品配額及普惠制的出口優勢逐漸削弱，而迅速開放的廣東珠江三角洲則以低成本的優勢逐漸取代澳門而成為香港廠商的首選投資地區。踏入1990年代，澳門更因經濟體積細小，特別是缺乏深水港，無法與其背後的經濟腹地，尤其是珠海、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區以及西江中下游地區形成緊密的戰略聯繫，其作為這一地區對外開放的橋樑和窗口的優勢，亦隨內地開放程度的提高而逐漸削弱。這也是珠海方面不重視與澳門合作的一個客觀原因。

二、21世紀推動粵澳經濟合作的基本經濟因素

踏入21世紀，隨著經濟全球化、區域化的推進，區域與區域之間的競爭已成為時代的主要潮流。在這種宏觀經濟背景下，粵澳經濟合作正出現一些新的推動因素：

第一，澳門賭權開放，引進競爭機制，澳門極有機會發展成為“東方拉斯維加斯”——區域內的綜合性、多元化旅遊娛樂城市，再創新的比較優勢。

長期以來，澳門一直是區域內的博彩勝地，然而，在博彩專營制度下，澳門的旅遊博彩業發展停滯不前。澳門回歸後，新成立的特區政府審時度勢、權衡

利弊，作出開放賭權的果斷決策。結果，來自美國、馬來西亞、香港、臺灣的眾多財團熱烈競投賭牌。目前，已取得新賭牌的三家公司均為資本雄厚，擁有豐富的賭博業管理經驗的財團。在競爭機制的推動下，相信澳門有相當機會發展成為“東方拉斯維加斯”——區域內的綜合性、多元化旅遊娛樂城市，再創新的比較優勢。

第二，香港、澳門與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正出現加快經濟整合的態勢，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將迅速推進。

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澳門的經濟陷入空前困難的境地，其產業結構的缺陷暴露無遺，加快與廣東珠江三角洲經濟整合的呼聲迅速高漲。在廣東方面，面對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的迅速崛起也產生巨大的壓力和挑戰，加強與香港、澳門經濟整合的迫切性也大增。第4次粵港聯席會議香港與廣東方面達成包括延長通關、開發南沙的6點共識即為明證。在新一輪的經濟整合中，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區的開發無疑將更受重視。在這種背景下，粵港澳區域經濟的整合勢必加速，成為推進粵澳經濟合作的重要動力。

第三，中國加入WTO在即，與世界各國（地區）的貿易、投資互動勢將加快，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必將加速。

澳門作為廣東珠江三角洲西部對外拓展的一個窗口和橋樑，如何能把握機會，發展成為區域內的中介性商貿服務中心，將是另一重要的挑戰。在國內方面，正在啟動的西部大開發中，包括四川在內的大西南及廣西西江中下游地區如何利用澳門開拓國際市場，也是一個

值得注意的問題。

三、新時期推動粵澳經濟合作的幾個關鍵性問題

上述分析表明，長期停滯不前的粵澳經濟合作，在踏入21世紀後正面臨突破性的契機。粵澳經濟合作正展現樂觀的前景。然而，要使樂觀的前景變為客觀現實，需要解決幾個關鍵問題：

第一，長期議而不決的橫琴島開發問題。

新世紀粵港澳經濟合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三地形成大珠江三角洲旅遊協作區。澳門開放賭權，向綜合性、多元化旅遊娛樂業發展的結果，將可能吸引大批到香港迪士尼樂園（現籌備興建中）遊玩的家庭式度假遊客。為配合這一發展態勢，橫琴島的開發將提到重要日程上。然而，長期以來，橫琴島開發一直議而不決，關鍵是粵澳雙方的立足點不同，視角不同，利益的差異不能協調。這個問題不解決，粵澳經濟合作難以有效推進。個人認為，橫琴作為“國

際特別旅遊區”的開發，在規劃上應與澳門旅遊博彩業的發展形成差別，避免競爭。針對澳門土地狹小和以博彩為主的特點，橫琴應側重發展土地密集型的旅遊娛樂項目，以度假、休閒為主。在投資的來源方面，以吸引歐美及港、台資金為主。

第二，澳、珠聯合建設深水港及興建廣珠鐵路問題。

澳門要推動區域經濟合作，成為中介性商貿國際城市，實質上深受缺乏深水港的制約。因此，改善港口條件以及徹底改善澳門與珠江三角洲北部以至大西南的水陸路交通運輸條件，就成為關鍵之一。解決這一問題，曾有多種建議。其中一個構想就是加強珠澳合作，在得到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將珠海部份具備條件的島嶼撥歸澳門興建深水港或合作興建深水港。不少專家認為，珠江口西部地區最適宜建設深水大港的地方就是在萬山群島地區，可考慮澳門與珠海合作興建。當然，這一構想在實施中將會遇到不少實際困難。有關珠澳合作

共建深水港問題，建議中央政府、廣東省政府及有關方面成立專門小組詳細研究。此外，應加快京珠高速公路和廣珠鐵路的建設步伐，徹底打通澳門與珠江三角洲乃至中國內地的交通大動脈，以真正發揮和強化澳門自由港的功能。

第三，香港、澳門與珠海三地的機場的合作問題。

港、澳、珠要發展物流業，三地機場的合作與協調也是一個關鍵。問題是三方能否找到協調利益的平衡點。

以上幾個問題不解決，粵澳經濟合作只能繼續停留在空泛的層面，並隨著時日的推進，加強雙方的競爭，而不能取得雙贏。令人感到比前樂觀的是，粵澳兩地高層已建立了每年會晤制度，兩地合作的常設官方機制——粵澳合作聯絡小組亦已於2001年5月正式啟動，並開展了一系列的相關工作，可以預期，本文上述的問題亦將會得到逐步解決，粵澳經濟合作亦將走上一個新的台階。

珠澳經濟關係的博弈分析

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 黃乃文

珠海和澳門在地理上同處南海之濱和珠江口西岸，有陸地相連、公路相通，雖受一關之隔，實為連體雙城。基於地緣和人緣，珠澳之間長期以來即存在緊密的經濟聯繫和相互的經濟合作，但合作的層次局限於由市場導引的民間合作，未能最大效率地整合兩地資源，相反，作為兩地經濟關係的另一面，珠澳之間的競爭與衝突制約了兩地的整體提升。本文嘗試利用博弈論模型對珠澳之間的競爭與衝突進行分析，指出兩地實

現“雙贏”的唯一途徑是通過合作謀求共同發展，進而提出了構建珠澳經濟協調與合作機制的若干思路。

一、“囚徒困境”：區域經濟關係中本位理性的悲劇

區域經濟關係包括合作與衝突兩個對立面。常識告訴我們，合作優於衝突：合作可使雙方受益，衝突（或競爭）則兩敗俱傷（至少互不得益）。然而經濟生

活中人們偏偏會選擇後者。是什麼緣故導致如此不智的行為？此處試用博弈論（Game Theory）中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模型來闡明其中的道理。

假定兩個區域的經濟行為主體（分別記為區域A和區域B）均具有經濟人（Economic Man）特性，即在區際經濟交往中它們分別以各自的區域利益最大化為目的。不妨把這種行為傾向稱為本位

理性，因為這是一種完全基於本位（本區域）利益的“理性”。由於區際經濟合作的主體是各區域的經濟組織或政府，它們都有維護本區域利益的動機（政府更以發展本區域經濟為己任），所以上述把區域人格化而為經濟人的假定是有其合理性的。以數字 1、0、-1 分別表示各區域的獲益，1 表示獲得 1 個單位的利益，0 表示既不獲益也不受損，-1 表示受到 1 個單位的利益損失，則兩區域的經濟關係可用如下博弈模型表示：

		區域 B	
		合作	衝突(競爭)
區域 A	合作	1, 1	-1, 1
	衝突(競爭)	1, -1	0, 0

顯然，對應著區域A和區域B同時獲得最大利益（1，1）的策略組合是（合作，合作）。這是理想的“雙贏”。然而事實上雙方博弈的結果卻與“雙贏”南轅北轍。試看區域A和區域B是如何選擇自己的策略的。首先，假定當任何一方單獨決策時，並不知道、或不能確定對方將採取何種策略，因而只能從己方立場出發進行判斷和決策，並且受本位理性驅使，決策的原則是實現己方利益的最大化。其次，任何一方選擇自己的策略時，雖然無法確定對方將採取何種策略，卻不能忽視對方的策略對己方利益造成的影響，因此他應該考慮到對方有兩種可能的選擇，並分別考慮自己相應的最佳策略。以區域A為例，從邏輯上講，在單獨決策時區域A應當考慮兩種情形：（1）如果區域A選擇“合作”，則相應地區域B有“合作”和“衝突（競爭）”兩種對策，若區域B選擇“合作”，那麼雙方的獲益均達到1，屬於“雙贏”，如此固然皆大歡喜，只是還有一種可能，即倘若區域B選擇“衝突（競爭）”，將會造成區域A的獲益為“-1”，可見在區域A選擇“合作”的情況下存在令區域A的獲益為“-1”的風險；（2）如果區域A選擇“衝突（競爭）”，則相應地區域B也有“合作”和

“衝突（競爭）”兩種對策，無論區域B採取何種對策，區域A都可以確保己方不至於受損，最不濟也不過是區域B選擇“衝突（競爭）”造成區域A的獲益為0。（1）與（2）兩相比較，從本位理性出發，可知區域A最穩妥的選擇是“衝突（競爭）”。區域B亦同理。最後，雙方基於各自利益進行理性選擇的必然結果，竟是採取了於任何一方都無好處的“雙輸”的策略組合（衝突，衝突），它是“囚徒困境”博弈的靜態均衡解。

“囚徒困境”模型揭示了一個很深刻的問題，即個體理性與團體理性的矛盾。反映在區域經濟關係上，即：每個區域分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卻是兩不得利（甚至兩敗俱傷），本位理性可以導致整體非理性。

二、珠澳經濟關係的博弈

珠海和澳門的經濟關係屬於區域經濟關係，同樣可以分為合作與衝突（競爭）兩個方面。在合作方面，珠澳之間長期以來即存在水、電和農副產品的供應關係以及邊貿性質的民間經濟往來，較具規模的經濟合作則發端於中國內地實行改革開放的特定歷史背景之下。澳門甫開，澳商捷足先登：1978年澳門商人曹光彪先生在珠海興辦的“香洲毛紡廠”，是國內第一家補償貿易企業；1979年澳門商人吳福先生在珠海投資興建的“石景山旅遊中心”，是國內第一家中外合資酒店；1980年澳門商人林錦成先生在珠海拱北興建的“銀海新村”，為國內的中外合資經營房地產業起到了示範作用。這些“第一”，有力地證明了澳門商人敢為人先跨地合作的意識很強。經過20年發展，目前澳門仍是珠海的第二大外資來源地，在珠海開辦的澳資企業達2000家左右，投入資金約達8億美元；同時珠海也以珠光公司為先導到澳門進行了一定規模的投資，共設立了近30家公司，兩地的投資關係已

發展到相互投資的層次。兩地的貿易關係更是日趨緊密，經由海關統計的珠海對澳門出口佔珠海出口商品總額長期位居第二，而未經海關統計的、每天從關閘魚貫而入珠海購物、消費的澳門居民，更成為珠海零售、農貿、飲食和酒店服務等的主要或重要消費力量。上述以企業和個人為主體的投資、貿易領域的經濟合作屬於市場導引的民間經濟合作，它使兩地經濟交相融合，幾成一體，在這一經濟合作層次上雙方信息充分、協調一致，在達成合作共識、互惠互利的基礎上共同發展，並無抵牾，可以說“囚徒困境”模型所述的不智行為在珠澳之間以企業和個人為主體的經濟合作中發生的概率是很低的。然而在以政府為主體的兩地經濟合作中卻非如此。近年來珠海和澳門經濟關係中出現的一些非合作行為，即具有上述“囚徒困境”模型的典型特徵：（1）各自為戰，產業趨同。兩地同為濱海名城，同以旅遊業聞世，澳門獨具博彩旅遊“人無我有”之優勢，相對而言珠海旅遊資源特色欠彰，但兩地未能從珠澳區域整體發展的大局出發去整合旅遊資源，協調發展，以達到互補共榮的“雙贏”，而是執著於本區域的利益，受“本位理性”驅使，與友鄰爭利於市，例如澳門格蘭披治國際賽車辦得有聲有色，珠海也去“克隆”一個，顯現出競爭而不是合作的姿態。（2）基礎設施重複佈局，造成資源極大浪費。這方面的最大敗筆，莫過於機場建設。珠海與澳門分別在相距不足30公里的空域內幾乎同時興建大型國際機場，時至今日兩個機場都“吃不飽”，運力遠超出實際需求，珠海機場甚至變成了珠海的負擔，而本來珠澳雙方完全可以共擇一地、共建一個機場、在機場的利益分配和運作管理上實行“一國兩制”、從而實現資源在區域空間的優化配置。雙方在機場建設上之所以如此不智，以博弈論觀之，蓋因雙方對此事完全是各自單獨決策，各行其是，缺乏溝通、協調和協作的機制，

以致陷入“囚徒困境”，顯現出典型的“團體非理性”。非獨機場，在大型港口、珠江口跨海通道等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的籌劃上珠澳兩地也有重蹈覆轍的傾向。

化解“囚徒困境”的途徑有二：一是博弈雙方在決策時充分溝通，合謀一致；二是把“囚徒困境”博弈重複無限次，博弈論已計算出它的均衡解。第一種途徑是靜態解，一次博弈即告完成，成本低，風險小；第二種途徑是動態解，周期長，收益小。由前述分析可知，珠澳兩地經濟合作在某些領域之所以陷入“囚徒困境”，“雙輸”而不是“雙贏”，主要是雙方在決策時互不通氣、畫地為牢所致，因此，從成本—收益以及可行性的角度考慮，珠海和澳門經濟合作的必由之路，是建立兩地之間的協調與合作機制，實現“雙贏”，而不是重蹈覆轍、一次又一次地演繹“囚徒困境”。

三、珠澳經濟協調與合作機制的構建

珠海和澳門雖同在一國之內，且在地理上連成一片，卻大不同於通常意義的區域關係。珠澳關係的主要特點是：兩地的社會制度不同，屬於“一國兩制”框架下的區域關係，即兩地兩制，珠海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澳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兩地分屬的關境不同，珠海既在中國的國境內亦在中國的關境內，澳門雖在中國的國境內，卻自成關境；兩地的行政地位不同，在國際上，澳門是單獨關稅區，可以單獨身份參加有關國際組織，締結有關國際條約，而珠海僅是中國的一個城市，無權以單獨身份進入國際社會；在國內，澳門是特別行政區，相當於省級，而珠海僅是廣東省管轄下的地級市；兩地的歷史、文化構成元素儘管與中華文化及粵文化一脈相承，仍有很大不同，澳門回歸前曾經有400多年屬葡萄牙管治，葡萄牙文化、殖

民地心理在澳門有一定程度的積澱，珠海則是中國改革開放後作為經濟特區從一個小漁村發展起來的年輕的內地移民城市，歷史文化底蘊相對單薄；兩地的產業發展有一點是永不雷同的，即澳門可以合法經營博彩旅遊業（這在全世界也不多見），而珠海絕不可能；兩地的人口規模、土地面積、市場發育程度、經濟發展階段等經濟變量也存在很大差異。差異性意味着互補性，巨大的差異意味着廣闊的合作空間，同時也決定了構建兩地合作機制的複雜性和艱巨性。

根據前面的分析，構建一個相對完善的珠澳經濟協調與合作機制，是避免兩地經濟關係陷入“囚徒困境”的必由途徑，而珠澳關係的複雜性使得博弈雙方獲取信息的成本和溝通協調的難度都較高，因此，珠澳經濟協調與合作機制的框架應當是包括官方、半官方和民間三個不同層次的多元化體系，在職能分工上各有側重。

1、珠澳經濟協調與合作的官方機制。可由珠澳互設常駐機構及雙方政府高層定期及不定期舉行磋商會構成，主要負責珠澳合作的宏觀協調和促進，如區域發展戰略與規劃的協調、通關制度協調、基礎設施建設的協調、合作深度和廣度的促進、跨境犯罪的聯合防範和打擊等。考慮到珠海與澳門在行政地位上並不對等，同時，澳門與珠海的經濟關係事實上並不止於兩地之間，而與廣東、香港息息相關，因此，澳門宜首先在廣東的省會城市廣州設立一類似辦事處的機構，再由該辦事處在珠海設立二層機構，把珠澳關係置於粵澳關係的框架之下。隨着粵港澳經濟一體化的加深，珠澳兩地政府高層磋商制度也應以粵澳、乃至粵港澳政府高層磋商制度的建立為前提。例如在珠江口建設跨海通道以促進要素在粵港澳三地之間、珠江三角洲東西部之間的流動，有效整合三地資源，這必須粵港澳三方政府高層通

力合作、合理規劃方有可能實現。據了解，加強區域合作正在成為大珠江三角洲各市領導人的共識：粵澳合作聯絡小組已於2001年5月成立；最近，珠海市委書記黃龍雲先生在廣東省第九次黨代會上明確表示：“為加快珠海市經濟發展速度，珠海市急切需要與港澳深穗等地加強聯繫，凡是有利於這種聯繫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珠海市都會全力參與、大力支持。”^①

2、珠澳經濟協調與合作的半官方機制。可由各種行業合作商會、合作研究機構及合作基金構成，有雙方政府支援的背景和公司企業基礎，主要負責珠澳合作的中觀協調，如兩地之間本產業（或行業）合作的協調與促進、跨地域發展規劃、與政府部門的溝通協調、與公司企業的溝通協調、具體合作措施的研究與落實等。目前應着手籌建珠澳旅遊協調促進會、珠澳商貿促進會、珠澳科技產業促進會、珠澳合作研究會等會社，可分別在珠海、澳門設立分會，定期及不定期舉行聯會，商討、落實兩地合作的發展大計和具體事務。

3、珠澳經濟協調與合作的民間機制。由兩地大量的公司企業和個人構成，在市場力量的驅動和兩地經濟、社會制度及海關管理制度的約束下，自由從事各種經濟活動，這些經濟活動包含着兩地微觀層面上的競爭與合作。由於澳門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珠海作為中國的經濟特區，其市場經濟體系正在建立和完善，因此，珠澳經濟協調與合作的民間機制應當是一種市場機制，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指引下，可以實現資源在兩地間的優化配置。政府在這方面所要做的，只不過是改善兩地的營商環境和促進要素在兩地間的雙向自由流動，包括促進信息的流動，以減少兩地企業之間由於信息不充分和缺乏協調溝通而陷入“囚徒困境”的概率。

^①《廣州日報》2002年5月23日

本中心主辦

“兩會專題”時事座談會紀要

九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及全國政協九屆五次會議(下稱“兩會”)經已圓滿結束。在會議期間,澳門區的代表、委員們認真審議了各項報告及決議草案,積極進言,發揮了澳門代表的應有功能。為讓本中心成員更深入地了解是次會議的具體情況和內容,本中心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晚上舉行了內部座談會,出席者除本中心的成員外,會議還邀請了多位學者及社會人士參與座談。是次會議由本中心會長梁維特先生主持,並邀請了其中兩位澳門區的代表,本中心監事長楊允中博士、副會長劉藝良先生向會議介紹了兩會的有關情況,然後展開互動討論,會議的討論氣氛熱烈,與會者各抒己見,有關內容撮要整理如下。

一. 介紹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下稱是次會議)的情況

首先,楊允中博士向會議介紹了是次會議的一些具體情況及個人的感受:

1. 會議概況

(1) 是次會議是本屆最後一次全體會議,會議的議程共有九項,共有2,866名代表出席了會議(現屆人大代表共有2,987名)。

(2) 在會議期間,澳門特區的代表團發揮了應有的作用,認真地審議了會議報告,積極進言,力求把有關澳門社會整體發展的情況、意見和建議較完整地向中央政府反映,而有關的建議書超過20份。與會期間受到較高規格接待,可以體現到國家領導人對澳門代表團是高度重視的。

(3) 去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展得最好的一年,GDP達到95,933億元,在全球外圍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仍有7.3%的增長,各項社會、經濟指標均取得相對理想的成果。此外,我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亦不斷提高,申辦奧運成功、順利加入WTO、APEC會議取得圓滿成果等,都使我國的國際形象繼續提升。

(4) 朱鎔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因應新形勢的發展需要,提出了本年度的八大工作任務,以及一系列的具體指標,受到代表們普遍贊同。

(5) 在我國加速進步過程中,還存在一些令兩會代表們深切關注的社會問題,如:①“黑洞、黑哨、黑股”的問題,②打造信用中國,整頓市場秩序,③面對入世,要全面提升國際競爭力,④環保、綠化、防沙、治水等可持續發展的問題,⑤關注西部大開發,關注東西部發展的不平衡,⑥法制、法治的推行難度仍較大,反腐倡廉是長期的任務。

2. 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選舉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辦法》(下稱《辦法》)的介紹

楊允中博士就《辦法》的主要條文和規定作了簡單的介紹,並認為這是“一國兩制”方針的體現。同時,透過人大代表數目的比例,以及國家在政策等方面對港澳特區的支持和照顧,可體會出國家領導人對港澳特區的關懷和重視,因此,作為澳門居民,應該更有使命感、責任感、壓力感和動力感,與全國人民一起關心、支持、參與國家方針大計的制定和實施。

3. 個人的體會、心得、理解、認識

(1) 這是一次成功的人大全體會議。今年是建國五十多年來,甚至是150多年來中國發展最好的一年,同時,也是我國民主法制建設達到全新水平的一年,是中國整體上最進步、最民主的一年。

(2) 回歸後的澳門特別行政區一向受到全國人民、中央政府的破格重視和禮遇,身為澳門居民、身為澳門居民推舉的代表,深感榮幸和自豪。

(3) 作為人大代表,應該首先考慮國家根本制度的完善和國家整體性的進步和發展,而不是個人的得失和進退。

(4) 作為澳門居民,應該首先考慮特區發展同國家的發展的一致性,為澳門成

功實踐“一國兩制”作出貢獻。

(5) 必須建立現代發展觀、現代競爭觀、現代民主觀,建立共處共榮、相對公平、求同存異、集思廣益的觀念。

隨後,劉藝良副會長亦向會議作了補充介紹:

1. 有關朱鎔基總理的工作報告

在是次會議的九個工作報告中,個人體會最深的是朱鎔基總理的工作報告,詳細地總結了去年政府工作的成績和所面對的問題,並提出了八項的工作任務以解決問題,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選舉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辦法》獲得最高票數通過外,朱總理的工作報告亦獲得第二高的票數通過,足見代表們對報告的認同度是很高的。

朱總理在其工作報告中強調了以下幾點:

(1) 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狀況下,加上美國“九一一”事件的影響,我國以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及穩健的貨幣政策等,繼續實現經濟的健康增長,使去年的GDP比2000年增長了7.3%。

(2) 使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重要因素是,建立良好的社會保障制度、增加農民的收入、落實國有企業的改革、保障下崗工人及退休人士的基本生活。

在國有企業的改革方面,目前已經過了三年的努力,如何能進一步深化此一改革,政府希望各代表提出具建設性的建議。

在農業改革方面,政府把加快農業和農村的經濟發展,努力增加農民的收入,作為重要的工作任務,更把“農民的收入是否增加、農民的負擔是否減少”,作為檢驗農業和農村改革工作的重要標準,這是一種新的觀點,同時亦顯示出國家領導人對農民生活的關注,體現政府對人民的關心。

(3) 為配合中國入世，必須大力整頓、規範市場經濟秩序，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的良性發展，嚴勵打擊假、偽、冒商品的犯罪活動。上述幾點充分體現了是次政府的工作報告既有全面性，亦提出了必須重點解決的問題。

(4) 工作報告中亦肯定了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的發展和“一國兩制”實踐的成功，並強調維持港澳兩地的健康發展是中央政府既定不移的目標，中央政府將全力支持港澳特區政府以及行政長官的依法施政，更將進一步加強內地與港澳在經貿、科技、文化、教育等領域上的合作關係，對港澳兩地的發展前景亦表示充滿信心。

2. 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李鵬委員長的工作報告

全國人大常委會李鵬委員長的工作報告體現了國家對法治建設的重視，強調立法精神和法制的建設。報告指出，為適應中國入世的需要，常委會制定和修改了多項的法律，如：信託法、商標法、著作法等等，目的是進一步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以增強外來投資者的信心。報告還指出，常委會視修改法律和制定法律為同等重要的任務，在去年通過的16個法律中，修改的法律就佔了11個。法制的不斷完善，確是使投資者的信心增強了。

3. 有關兩會的補充介紹

(1) 在對九項工作報告的投票過程中，“兩高”的工作報告得票相對較低，反映出代表人民意見的代表們認為國家的法制建設仍然存在不足，需要加大力度去改進及進一步完善。

(2) 國家領導人及國務院有關部門對人大代表的意見和建議越來越重視，不但重視收集和聽取，並以最短的時間給予跟進和回應。

(3) 在審議各項工作報告的過程中，充分體現出國家領導人為做好政府的工作，要求實事求是，不許浮誇，並強調三個特點：①眼睛向內，要考慮國家入世後，如何做好國家的內部事情。②眼睛向下，要關注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對落後地區人民的關心，並要充分反映民意。③眼睛向前，要向前看，強調注重工作的迫切性，強調各級政府的職能分配。

(4) 在參加會議的過程中，感受到澳門

特區的地位有所提升，對於粵港澳區域合作問題亦有較多的關注，因此，澳門必須繼續不斷自我努力和提升，以不斷強化自身在區域合作中的地位。

(5) 澳門區的代表履行了應有的職責，除提出了超過20份的建議書外，亦把澳門部份居民對內地的一些意見，在內地所遇到的問題等向中央及有關部門轉達。

(6) 國家對文化產業的發展亦是很重視的，除希望其可以豐富人民的生活外，還希望其可以成為我國的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

二. 會議就兩會情況展開了互動的討論

1. 有與會者提出，在是次會議上，澳門區代表提出了超過20份的建議書，當中最為代表們所關心的是哪些問題？有哪些問題是代表們有共識的？

兩位代表回應說，人大代表向國家提出意見和建議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建議，另一種是議案，兩者的法律地位是相等的，但處理的方式不同，建議可以直接送交有關的行政部門，它會根據法律法規的規範，在其權力範圍內予以處理及解決。而是次會議上所提出的建議書大多數是以澳門區代表的個人名義提出的。當中，代表們比較關心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 內地與澳門之間的合作關係，例如，在粵港澳區域合作的問題上，建議中央建立一些專項的常設機制等。

(2) 有關內地的法制建設、司法獨立以及建立“一國兩制”博物館的建議等問題。

(3) 有關內地的教育體制改革，以及加強管理的問題。

(4) 有關澳門居民赴內地投資、經商或旅遊時，所遇到的一些難題，例如：

- 澳門居民在赴內地投資時，遇到一些必須通過司法程序去解決，但又未能得到適當處理的問題，或者是存在“執行難”的問題；

- 澳門居民、境外居民攜帶存摺等入境時，被拱北海關視為攜帶有價證券而處以罰款或扣留的問題等等。

2. 有與會者認為，身為澳門區人大代表，既要關注澳門社會各方面的事務，亦應盡量關注國家層面的事務，有效地行使澳門居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機制。

有與會者認為，是次會議上，澳區人

大代表以個人名義分別提出意見和建議，可能會出現重複的現象，建議日後把各代表的議案綜合整理，突出幾個焦點問題向中央反映，這樣將更能引起中央的關注，亦可以避免資源重複或浪費。

有與會者建議將代表們提出的所有提案、意見或建議整理成匯編，既可作為歷史性的參考或跟進，亦可作為對有意再參選成員的一種評核資料。

3. 兩位代表回應說，澳門區各位人大代表既關心國家的整體事務，亦希望站在澳門居民的立場上為澳門出一分力，例如，每次到內地考察，都是圍繞國家、人民所關心的問題去提出意見的。而在考慮提出意見和建議時，亦是優先考慮與澳門特區相關的事務，但由於每個人在某些問題上理解、認識可能會有所不同，故行使代表權利時亦應有所靈活，不必事事完全一致時再提出。

4. 有關澳區人大代表與澳門居民的溝通和聯繫方面

(1) 有與會者認為作為澳門居民的代表，澳門區的人大代表們應該加強與澳門居民的溝通和聯繫，目前，澳門居民對於代表們向國家所反映的意見和建議的內容都不大清楚，希望在往後的日子裏，代表們可以透過各種的渠道，如在參與人大會議的前後，多舉辦類似的座談會，更廣泛地收集澳門居民的意見，從而更充分地向國家反映澳門社會所關注的問題，或向大家介紹會議的具體情況。

(2) 有與會者建議澳門區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可考慮在澳門設立辦事處，提高澳門居民的參與性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透明度。

兩位代表回應說，身為人大代表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亦應關注市民的需求，同時表示，希望廣大市民能通過各種途徑積極反映更多的建議、意見或所遇到的問題，需要時一定及時向中央反映。

5. 其他意見

有與會者提出，澳門居民返內地時每次需經過四檢，可否考慮簡化為兩檢，即澳門與內地邊檢部門只分別負責入境檢查，既可反應回歸後的新形勢，又有利於提高通關效率。

編者語

澳門特區政府在2002年度施政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了澳門未來產業結構的發展方向，為澳門未來整體發展指出了明確的目標。然而，要使澳門未來的發展定位得以實現，除了政府有關部門必須配合並貫徹執行外，澳門社會各界亦必須因應定位，以自強不息的態度，共同作出積極的努力，才能推動澳門社會和經濟的整體發展。為了啟發大家共同思考上述問題，本中心在2002年5月26日舉辦了主題為“齊為澳門動腦筋——因應定位、自強不息”的座談會，邀請了社會各個界別的社會人士，共同就會議主題各抒己見，並期望藉此引起社會上更廣泛的討論和更深入的探討。這個座談會得到了多個社團和各個界別朋友的支持，提出了許多不同的意見和建議，如果各位讀者有興趣了解座談會的內容，敬請留意本中心即將出版的座談會發言彙編。

為了不斷地傳遞自強不息的訊息，本中心除了舉辦上述座談會外，還應邀參加了其他社團所舉辦的相關活動，本期的《發展策略》特輯錄了部份本中心負責人在參加相關座談會時的講話內容，

供各位讀者參考，以達拋磚引玉的目的。

為迎接新世紀全球社會發展變化所帶來的挑戰和機遇，除了要以自強不息的態度，不斷自我努力之外，還可以透過積極尋找具有互補優勢的合作伙伴，以發揮1+1>2的效應，來強化自身的優勢，從而取得更大的發展。對於屬微型經濟體系的澳門來講，區域互補合作是推動澳門整體發展的有效方法之一，因此，以積極的態度探討區域合作的課題，是澳門社會應該重視的，而社會上對此課題亦是非常關注，為此，我們亦搜集了部份內地學者關於澳門與鄰近地區互補合作的論文和大家分享，藉此引起大家的共同討論。

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得到了充分的落實，澳門社會各界除了關心澳門社會的發展狀況外，對於國家大事亦非常關心，這是愛國愛澳的具體表現。在今年三月份，九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和全國政協九屆五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全國人民，包括澳門居民都非常關注，為了讓本中心成員更深入

了解兩會的內容，本中心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舉行了一次內部座談會，邀請了本中心兩位身兼人大代表身份的領導架構成員楊允中博士和劉藝良先生介紹有關會議的具體情況，亦同時藉此機會讓兩位代表了解與會者對於國家政策及對於各位人大代表的工作所寄予的期望和需求，達到相互溝通的目的。會議的討論氣氛熱烈，達到了預期的效果，為了讓大家都可以分享與會者的意見和觀點，我們特將有關的討論內容整理並刊出，希望引起大家對相關內容的討論，向我們提出反饋的意見。

《發展策略》是本中心向社會各界介紹本中心各項工作及活動的刊物，亦是我們和澳門社會各界廣泛接觸的方式之一，因此，我們除了刊登一些本中心的訊息和有關成員的論著之外，還歡迎各位讀者惠賜鴻文，以豐富本刊的內容，從而達到共同探討社會問題，相互促進和提升的目的。如蒙賜稿，謹請聯繫本中心秘書處 [電話：853-780124; 傳真：853-780565; 電子郵件：cpedm@macau.ctm.net]。